

宋銳

聲雷集

(人物志)

海康县文联编印



宋锐

宋锐同志，1917年夏生于海康县城。省剧协、省民研会员。1950年秋，毕业于南方大学后，在海康、湛江、徐闻等地从事文教及雷剧改革工作。四十年来，为雷歌、雷剧以及地方文史做了一定的贡献。

在海康、湛江的岁月里，既应省人民出版社及粤西雷剧团的要求而整理了《秦雪梅》、《李三娘》、《千里缘》等雷剧传统剧目；又为湛江专区艺校雷剧实验班的教学需要而移植了《三月三》、《飞夺泸定桥》以及《游乡》、《补锅》、《打铜锣》等兄弟剧种的优秀剧目。六十年代初，还为粤西雷剧团特地创作了以嘉庆年海康乌石二海上起义反清的动人事迹为题材的雷剧《天南烈火》，并赢得了观众好评。

七十年代末，在徐闻告别了粉笔生涯而重返阔别二十年的海康文化岗位之时，曾一鼓作气地撰写了《雷歌发展史》和《雷剧发展史》二稿。两“史”既成，又趁热打铁，先后整理了《进和番》（易名《丛台别》）和《真假状元》（易名《回杯记》）等雷剧传统剧目。

一九八三年秋初，按规定办理离休了，但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雷歌、雷剧以及地方文史依然鞠躬尽瘁，悉力以赴。他，一边为市、县分别编写了《雷剧志》以及《海康县文物志》、《海康县沿革志》，一边为海康修建西湖、三元两公园所需历史资料及各类简介而忙。当三“志”两“园”之事甫竣，而省之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任务适来。他，受县之托，义无反顾，为时经年而《海康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辑任务，便又如期完成了。

宋锐同志今虽年逾古稀，而倔强犹昔，于雷歌、雷剧的钻研，于海康县志、海康文史的纂辑，还是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在他“离”而不“休”，锲而不舍的苦干下，深信在他的晚年岁月里，还会取得更不等闲的劳动成果。

序

陈 光 保

宋锐同志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聪颖好学，博览群书。他为人诚实正派，热爱家乡。对雷歌、雷剧以及地方志乘、名人著作都精心研究，有“雷州活字典”和“雷州活历史”的雅号。

他离休多年，依然老骥伏枥，壮心未已，七十高龄，仍争分夺秒，著书立说。他那支笔尖所洒下的墨水，说是雷州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并非过甚其词。

雷州人民喜爱至笃的雷州歌，豪情奔放，源远流长。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目为鄙俚不文，不登大雅之堂，以至通志不录，府县志不载，地方人士的著作也避而不谈。可是，宋锐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四十年来，他不但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还呕心沥血地撰写了十多万字的《雷歌发展历程》和《雷剧发展史》两部文稿。这既是他潜心探索雷州歌剧发展过程的结果，也是当前关于雷州歌剧发展过程不可多得的史料。

海康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徐闻县以为合浦郡治以来，既是隋前州郡之治所，也是唐后雷州府署的所在。北往高凉而南下琼儋，东通闽浙而西赴非欧，水陆畅通，物产茂盛，人文景观相当丰富。宋锐同志把这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沿革以及名胜古迹等事整理得来龙去脉，有条不紊，有心涉猎，一目了然。非惟为雷州人民认识历史、爱护文物提供了极大方便，且使广泛的群众从中受到更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汉徐闻县治旧址之在海康县城，历代史志固论之甚详，当代辞书如《辞海》、《辞源》也注释甚明：“海康”为“汉置徐闻县，而隋改海康县。”可是，自从早些年雷州半岛极南地带发现了若干所谓东汉墓葬之后，有人便援引明清某些舆地著作中以讹传讹的论述大作文章。宋锐同志在这方面一边稽查历代史志记载，一边考究众多舆地论著，反复校勘，认真辨析，终使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差错铸成于明天顺六年李贤的《天下一统志》，而始作俑于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宋锐同志为雷州半岛的历史做了非常有益的澄清，也为海康等县的沿革作了很有价值的辨正。

海康为天南重地，从两汉的伏波将军路博德、马援到唐代李邕、元琇而宋代寇准、李纲、赵鼎以及苏轼、苏辙、秦观、胡铨，来过不少名将贤相以及文学大家；而地杰人灵，从唐代的陈文玉到清代的陈瑛、陈昌齐而旧社会的黄杰、许克生，也出了不少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宋锐同志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丰功伟绩，或编《人物志》，或写《故事选》，深入浅出地为大众做了一些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人物的工作。

宋锐同志多才多艺，在研究雷州历史、文物以及探讨雷州文化等方面的造诣固深，在雷

州歌剧的编写方面也有其一定成就。此次编入集子的《雷剧选》、虽只是他编写过那几十个雷剧本的几个选场，而字里行间仍可看出他的雷剧写作功底。唱词文而明白如话，引吭高歌则又行云流水，耐人寻味，可说真正做到音清腔圆雅俗共赏。

这次，县文联编印宋锐同志的选集，除上述《雷歌·雷剧发展史》、《沿革·文物》、《人物志》外，还有《歌谣选》、《情义歌选》、《姑娘歌选》、《榜歌选》、《运河之歌选》，凡十一种，四十五万多字。其中，民间文学部分虽来自民间，而他数十年来在搜集、整理、编选等方面也曾付出了不可估量的精力。

宋锐同志不仅治学严谨，而且立场坚定，对党一贯忠诚。他既不为名，也不图利，襟怀坦荡，平易近人。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埋头苦干，从不为“官”字着想，而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他这种精神是难能而可贵的。县文联把他数十年来的劳动成果汇编成集，是很有必要的。

前 言

近些年来，为了探索雷州歌和雷州歌剧的发展历程，曾经一而再地阅读了今存的地方志乘以及当地文人学者的诗文之类的集子。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不少有关雷州半岛——特别我的老家海康的沿革、胜迹以至地方人物的颇有说服力的资料。

这些资料，有的用之于编写雷州歌和雷州歌剧的发展史，有的用之于西湖、三元塔两个公园，有的则先后刊载于某些报刊与平县政协编印的《海康文史》。

这个集子所辑入的就是这几方面资料的若干篇章。涉及面如此广泛，每一问题的论述就不可能包罗万象，概括无遗。这只不过管中窥豹，但见一斑而已。

当然，就是这么“一斑”，也不过是我个人的一蠡之见。假如这些肤浅的看法，能够引起关心这些问题的同道的注意和理解，我就感到无限欣慰了，要是惠然赐教，匡其不逮，那就更为高兴了。因为我的认识也许并不尽然。

目 录

到过雷州的伏波将军.....	1
雷公庙与雷祖陈文玉.....	8
“廉能爱民”颂陈宾.....	20
名高望重话观楼.....	30
海康巾幗志.....	45
旧人新志.....	63

人 物 志

到过雷州的伏波将军

海康县城之南有一座年代久远的伏波庙，世说这是为了纪念汉朝的伏波将军而创建的伏波庙。伏波将军真的到过被目为天涯海角的雷州半岛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到过雷州这地方的伏波将军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东汉初年南征交趾，“规复汉家文物”的新息侯马援；另一个则是西汉中期讨伐南越，“烟开九郡”的邳离侯路博德。

路博德是怎么来的呢？说来话长，得从“并吞六国，统一天下”的秦始皇谈起。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始皇本纪》：“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后来，被秦始皇任命为南海尉的任嚣病死了，“行南海尉事”的赵佗野心勃勃，就西击桂林，南取象郡，并“自立为南越王”。那时候，南岭以南的一大片地方都是赵佗的世界，在他的心眼里是“不知有汉”的。

赵佗四传至赵兴，其丞相吕嘉总揽南越大权，羽毛已丰，就不赞成“稽首称臣”于刘汉王朝了。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四月，吕嘉公开背叛汉室，杀汉使者终军——“请长缨以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的终军，又以兵狙杀汉将韩千秋。以雄才大略著称的汉武帝刘彻，这才在这一年的秋天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然后会师番禺，合歼南越。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十月，路博德既“得吕嘉首”，“遂定越地”，（《汉书·武帝纪》）就把它分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那时候的雷州半岛隶属合浦郡，而郡治就在同年设置的徐闻县，所以，《汉书·武帝纪》有所谓“置合浦郡，治于徐闻”的记载。

这个徐闻县所管辖的地盘相当于整个雷州半岛，县治就设在半岛腹部的海康。它的故址就在今天的海康县城。明朝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黄佐纂修的《广东通志》记述得很清楚：“汉徐闻县旧址，即今雷州府署。”

南越既平，路博德的使命不是已经完成了吗，为什么还要亲到雷州半岛来？是的，南越之“乱”平，九郡之“置”始。置九郡决不是纸上谈兵，总得有个经营过程。路博德之南下，正是为了这一个重要任务：第一是设置合浦郡，第二则是开珠崖而定儋耳这两郡之地。当他渡海而南，“振旅而北”，往返雷州半岛，海康县属的“将军驛”以及遂溪县属的“武乐水”，都是这一军事行动的历史见证。

武乐水，乃发源于遂溪县属的螺冈岭而“南流转入东海”的一道溪流。清朝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博白朱德华主编的《遂溪县志·古迹》便有这么一段记载：“汉时，伏波将军路博德驻师于溪北岸，水声潮涌，与军中笳鼓之声相答”，因名“武乐水”。

这一记载虽寥寥数语，却很不寻常。它令人想见路伏波当年所统率的队伍是一支无坚不摧、无敌不毁的队伍。看吧，豪放而激昂的军中笳鼓与滔滔汨汨的东流逝水谱写了声遏行云的交响乐章，路将军的军容多么壮盛！难怪从粤西而粤东，从南海而海南，征旗所

指，无往不利·无往不胜！

至于“将军驿”，群众叫它“将军圩”。据老一辈人的辗转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还是一个颇具规模的集市。每一圩期光是耕牛交易便多至一百多头，当年熙来攘往，人烟噪杂的热闹情景可以想象。是兵燹，是匪祸，还是清朝初年位于西北边的南兴圩崛起之后夺走了它的繁荣？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郑俊纂修的《海康县志》所记载的“集市”已经没有它的名字了。

到了本世纪的三十年代，海康经龙门而至徐闻的海徐公路畅通之后，除了一些步行旅客以及肩挑小贩贪图便捷而偶尔一经之外，名存实亡的将军圩已是野草丛生、荒凉满目的一片废圩了。

然而，它位于海康、徐闻之间，南兴、英利之际，自古至今都是“北达雷城，南通琼岛”这一南北要道的一个中转站。不说遥远的秦皇、汉武之世，也不说唐宗、宋祖之时，就是海徐公路通车之前，它还是徐闻至海康非经不可的终南捷径。

当年，路伏波南下海南，“饮马儋耳”而“焚舟琼山”以示“弗复用兵”时，在这一南来北往的古道上，披星戴月，沐风栉雨，固然滴过艰辛的汗水，留下斑斑的脚印；而在这“古称险阻”的斜阳旧驿里，还飘过他那猎猎军旗，响过他那豪壮军鼓哩。

不过，“驿”也好，“圩”也好，都已“流水落花春去也”了，且不刨根问底，多所论述，而“驿”或“圩”之上，都冠以“将军”二字，这就不能不引人注意，惹人寻味了。

康熙年郑俊主编的《海康县志·建置》说是“因地有二将军墓”，而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陈昌齐纂修的《海康县志·古迹》却说是“二石如将军”。到底“将军”这地方是以“墓”得名，还

是以“石”得名呢？以“石”得名，是哪两块“石”？以“墓”得名，又是哪“二将军”之“墓”呢？

现在，“墓”既不可复寻，“石”也不能再得了。“墓”“石”之说，地面已没有实物作证了。三十年代梁成久所主编的《海康县志·金石》所载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教授何达聪《重修将军桥路记》里却有“汉马伏波驻兵地”这么一句话，与郑志所记颇有关联之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将军驿”所以得名的依据。

路伏波南来北往，两经将军驿，在这驻过兵是毫无疑义的了，而立志边疆、壮怀激烈的马伏波是否也曾莅临将军驿，并在此地驻扎过兵马呢？

根据史籍记载，路博德南下琼海的一百五十二年后的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马援也以“伏波将军”之称来过雷州，也到过这个号称“将军”之驿。《汉书·光武帝纪》云：“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春，二月，交趾女子征侧反。”征侧跟她的妹妹征贰一同背叛汉朝，攻没其所在郡后，南据九真、日南，北占合浦等“岭外六十余城”，并“自立为王”。因此，叱咤风云，重建汉家天下的光武帝刘秀，效法乃祖刘彻，于建武十八年四月，“遣伏波将军马援，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贼征侧等”。（《汉书·光武帝纪》）

征侧之反也，“岭南震动，雷复没于夷”；马援之讨交趾也，大兵南下，先复合浦，再西击交趾而南平日南、九真诸郡。雷州半岛乃当年合浦郡治之所在，马援之到，乃势所必然。一是由于“征侧及其女弟征贰反”之时，“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合浦郡既“没于夷”，马援的部队就有责任拯斯民于倒悬，先去收复

它，以扫清进军路上的第一道障碍，从而解除直捣“黄龙”的后顾之忧。

何况马援“军至合浦而楼船将军段志病卒”，皇帝既“诏援并将其兵”！即使马援所率的那支浩荡王师原是南下粤西，直指交趾的，到了这时，为了接管段志一军的兵符印信，就非到作为合浦郡治的雷州这一边来不可了。

更何况马援与段志在早些年里还是同奔沙场并肩战斗过的一对搭档！据《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六年“秋七月，妖巫李广等群起据皖城之时，光武帝刘秀便差“遣虎贲中郎将马援，骠骑将军段志”以“讨之”。到了“九月，破皖城”而“斩李广等”，这一对战友就一同为汉家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了。所以，公乎私乎，马援都得亲莅雷州，拼挡一切。

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是海康城南既有伏波庙，又有伏波井。这口井所以命名“马跑泉”，据故老传说及地方志乘记载，乃马伏波驻师此地时战马之蹄踢了出来的。自东汉至今，历时已经一千九百多年，而泉清水冽，仍为群众所乐用。明末广东著名诗人屈大均的《雷阳曲》“月明齐汲伏波泉”之句，写的正是这一古井。

二是“军至合浦而段志病卒”，段志到底死在哪里？是雷州城，还是另有其地？我们认为段志是死在将军驿上。段志是“楼船将军”，所统率的是“楼船”。楼船南下至合浦，就必须沿着雷州半岛的东西海岸前进，由东而西。从后来马援“缘海而进”的迹象看来，段志病死之时，也许他的楼船正在进行着这一军事行动。他就只好滞留在将军驿上。

不幸的是，段志出师未捷身先死，而且死时正是讨伐交趾之始。

在这戎马倥偬、用兵正亟的情况下，既不便于马革裹尸，归葬洛阳，就只好男儿志在四方，就地埋其忠骨了。郑俊《海康县志》“地有二将军墓”的记述，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佐证。

“二”，可作“副”解；“二将军”不就是“副将军”？征讨交趾之役，“追前所已成之勋，托之名以惊动群听”（宋袁谭《伏波将军庙记》），马援以“伏波将军”衔挂三军之帅，而“楼船将军”段志，也师杨仆之于路博德故事，率领“大小二千余楼船”以为马援副手，故称“二将军”。“其地有二将军墓”，就说明其地有段志之墓。将军驿之所以得名，以段志将军之“墓”，是名正而言顺的。

马援赶到将军驿以处理段志所领一军的领导权后，“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缘海而进”，一来一去的空前盛况，从雷州半岛流传很广的一首古老歌谣还可以窥见一二：“将军上，将军下，三百郎子放爆仗。”

“下”者，将军之南“来”；“上”者，将军之北“去”。征侧背叛汉家，雷人“被发左衽”经年。马援所率王师一到，拯黔黎于水火，使之重睹天日，雷之人欢天喜地，万炮齐鸣以迎将军，可以想象。及其征旆西指，而将军功在汉室而德在雷州，雷人眷念不忘，鸣炮致意以欢送王师，又是理所当然。民谣“三百郎子放爆仗”，正如实反映了马援在将军古驿所受到万众“迎”“送”之情。

马援，不仅是“声威远播”的名将，而且是文章老手。在传诵今古的古文集子里，便曾收集了他几篇著作。《诫兄子严、敦书》便是其中之一。据叶幼明等选注的《历代书信选》，这封信乃“汉光武建武十八年，马援南征在前线写”的。前面提到的明末广东名

诗人屈大均，在晋谒海康县城的伏波祠后，写了一首《伏波祠》的诗章。从这首诗中“马留遗子姓”之句来看，这个“前线”的准确地点极可能就是“马留”。

为什么？因为建武十八年四月，马援奉命出师：“军至合浦”而“段志病卒”，从洛阳行军至雷州，当在夏秋之间；办理段志善后事宜，再驰往西海指挥楼船北上，时间可能是秋冬之际。看来，段志生前所率领的楼船，这时已绕过琼州海峡而待命于北部湾东边的“马留”了。这个马留在哪？在今海康县属英利区的田头圩那边的海滨。马援“缘海而进”的始发点，也就是说他致书侄子的“前线”，就在“马留”这个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遂溪县属的乐民，据说既有伏波庙，也有伏波井，而且，还有关于伏波将军的传说，这就说明马援所率的兵船是沿着雷州半岛的西海岸北上，然后西经安铺、北海而前往交趾的。不过，从今之合浦而至越南，沿途遗迹累然，而雷州这边，则只有马留与乐民两地剩下蛛丝马迹了。

清嘉庆年陈昌齐纂修的《雷州府志·沿革》在记述马援于建武十八至十九年征交趾一事时，有“是时，援略地至雷州”之句，说明马援到过雷州，是无可疑义的了。有趣的是，明朝《正德琼台志》卷三十三记载：“马援既定珠崖，立城郭、置邑，立珠崖县。”按照这一记述，马援不但到过雷州，而且到过海南。然而，明嘉靖年纂修《广东通志》的黄佐在《平黎记》中却否定了这一说法，他说：“后伏波新息侯特以隔海立县，招抚功，未尝一卒渡海。”（此见《儋县志》上册第653页）这么说来，马援驻马徐闻，“隔海立县”，没有去过海南，黄佐的话是对的。为什么？马援奉光武帝刘

秀之命是伐交趾而不是平海南，合浦郡虽已光复，而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仍在敌手；海南可以隔海立县，而交趾就非亲自带兵奔赴前线以直捣黄龙不可了。

可见马援到过雷州，到过“将军”，到过马留。所以我们说，到过雷州半岛的伏波将军是两个：一个是“兵不血刃”而平定南越的路博德，另一个则是身经百战而征服交趾的马援。尽管北宋徽宗赵佶是一个穷奢极欲，祸国殃民的昏愤皇帝，可他于宣和二年（1120年）加封伏波将军的诰文“峤南万里，遗爱犹存；庙食千年，英风尚凛”之语，却写得恰如其分。

雷公庙与雷祖 陈文玉

在神权不可一世而“雷”的庐山真面目还没有很好认识的年代，雷州人的确敬“雷”如神，为“雷”立庙。只不过这些庙宇一般不称“雷公庙”，而叫做“雷首庙”。这是由于古人认为“雷出万物出，雷入万物入”（见丁谓《重建威德王庙碑》），以其首出万物而称之为“雷首庙”。

可是，在唐“昭宗时，官广州司马”的刘恂却在《岭表录异》补遗中说“雷州之西有雷公庙”，而北宋文学家李昉等人编辑的小说集《太平广记》中更有一篇煞有介事地描绘雷州有个不怕雷神的人在雷公庙中大“砍雷公”的动人故事。看来，在唐宋之世，雷州

是有过雷公之庙的了。

这个“雷州之西”的“雷公庙”到底是在哪里？有趣的是，北宋地理学家乐史似乎注意及此。他在他的地理专著《太平寰宇记》的“海康县”下是这样回答了这个问题的：“雷公庙，在州西南七里，唐咸通十二年置。”查“咸通”乃懿宗年号，“十二年”为公元871年，比刘恂《岭表录异》成书的时间起码要早二三十年。乐史这书中所说的雷公庙应该就是刘恂书中所提到的那个雷公庙了。论位置，刘恂的“雷州之西”虽然不如乐史的“州西南七里”那么具体，但从行文看，两者基本是一致的。何况这庙的创建时间比“咸通十二年”还早得多呢！

雷州城的“西南七里”的确有一个与“雷”有关的古庙那就是至今还岿然屹立于海康县城——也就是旧雷州城西南七里英榜山上的“雷祖庙”。雷祖庙也叫“雷祖祠”，创建于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乐史所谓“咸通十二年置”，不是始“置”，而是重“修”。庙内所祀奉的是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至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先后充当东合州以及雷州刺史而为雷州人尊之为“雷祖”——雷州之祖的“白院公”陈文玉。

根据宋大中祥符年间由殿中丞而出知雷州军事的吴千仞的《英山雷庙记》，这庙除了祀奉陈文玉之外，还“塑雷神十二躯，应十二方位，各饰神冠，执剑刀斧钺之类。至于雷公电母，风伯雨师，轮鼓电火，各以板图像，立于庙中”，这就是《岭表录异》补遗所记“百姓每岁配卒造连鼓雷车置庙内”的来由了。

不过，这庙所祀的主要对象是“雷祖”而不是“雷神”或“雷公”。“雷神”“雷公”只是“雷祖”的众多侍卫之一而已。也许

是因为庙中有“雷神”“雷公”之像吧，“雷祖”之庙就被讹传为“雷公”之庙了。

当然，根据宋吴千仞的《英山雷庙记》以及明崇祯十年副使庄元贞所编辑成书的《雷祖志》，雷祖的诞生跟“雷”是有过一段神话般的特殊关系的。

《雷祖志》说：“州西南七里有村曰‘白院’。居民陈氏讳铁者业捕猎，养有九耳异犬。每猎，皆卜诸犬耳，获兽多寡与耳动之数相应。陈太建二年九月一日，犬之九耳俱动，陈喜曰：‘今必大获矣！’鸣其邻十余人随犬往。至州北五里地名‘乌卵山’，有丛棘密绕，犬自晨吠至日昃，无一兽出。猎人奇之，伐木而视，犬挖地开，获一大卵，陈抱归家。次早，风雨雷电交至，陈大恐，置卵于庭，遂为霹雳所开，内出男子……陈养之，名曰‘文玉’。”

宋之佞臣丁谓自崖州贬所量移雷州时，曾为雷祖之庙立过《重建威德王庙碑》。碑中所引“旧记”与此大同小异：“始者，北里居民陈氏者，家无子因射猎××中，获一大卵，围及尺余，不知其何而为何用，置之而已。忽一日霆霹而开，遽生一子。鞠育抚养，遂承其家。乡俗异之，曰‘雷神’。”

两则记载在“巨卵育胎”及“雷震而出”两事彼此大致相同，而吴千仞和丁谓所作碑文的“乡俗”称“雷神”一说，跟“雷”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

“卵”能不能孕育出万物之灵的人来呢？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已是非常明白而不必多所赘论的了。吴记丁碑神化了“雷祖”之“生”，《雷祖志》则更进一步神化“雷祖”之“死”：“贞观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率文武僚属具题城工告竣，彼时即生两翼，白日

升天。”正如金陵王铎所题：“不丹而化，不鹤而骑。一官功满，白日天衢。”（见《雷祖志》）于是，古往今来，在“卵而生，震而出”的基础上就又多了一个“翼而神”的传说了。

其实“雷祖”陈文玉是“人”而不是“神”。他于“唐贞观时辟茂才，仕为本州刺史”（见《广东通志·雷州府乡贤志》），“破古合之天荒，开擎雷之草昧”（南康府陈子恭题联），在雷州半岛的开发过程中有过很大的贡献，是两汉二伏波将军——西汉邳离侯路博德和东汉新息侯马援之后功垂史册而德在雷州的又一著名历史人物。他的“伟迹嘉猷，早擅于生前”（见清广东按察使陈文《雷祖志序》），而为海北同钦，名昭万载了。神化其“死”，殊不过多此一举！

清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广东巡抚完颜瑚图礼为重刻《雷祖志》而撰写的序言便特别指出：“雷祖由来已久，夷考其事业……以此庙食千载……足以表其乾坤正气之钟，而著吾儒直方刚大之概。乃粤之人顾于其卵而生、震而出翼而为神之说凿凿传闻，谓非此不足以显其神奇之迹。噫！是宜诞也。”看，身为一省大员的完颜瑚图礼，在一百多年前有此真知灼见，且在《雷祖志》中直言不讳，其胆其识，实在了不起！

陈文玉是古徐闻而今海康县人，生于南北朝时期的陈宣帝太建二年（公元570年），父陈玘，以打猎为生，母吴氏年五十而只生三女。这三个女儿曾发誓“愿不出嫁，事父母终身”，但“祈天赐父母一男，以绍来世”。文玉之所以能够抚养成人也，就得力于他的姐姐。

文玉生而“资质明敏，貌相超常”。既长，“武力绝伦，叱声